



人权理事会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八十三届会议(2018 年 11 月 19 日至
23 日)通过的意见

第 89/2018 号意见，事关 Alexey Pichugin (俄罗斯联邦)* **

1.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系根据前人权委员会第 1991/42 号决议设立。前人权委员会第 1997/50 号决议对工作组的任务作出了明确说明并延长了其任期。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和人权理事会第 1/102 号决定，人权理事会接管了前人权委员会的任务。人权理事会最近一次在 2016 年 9 月 30 日第 33/30 号决议中将工作组的任期再延长了三年。

2. 工作组依照其工作方法(A/HRC/36/38)，于 2018 年 8 月 17 日向俄罗斯联邦政府转交了关于 Alexey Pichugin 的来文。该国政府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对来文作出了答复。该国已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3. 工作组视下列情况为任意剥夺自由：

(a) 显然提不出任何剥夺自由的法律依据(如：某人刑期已满或尽管大赦法对其适用，却仍被关押)(第一类)；

(b) 剥夺自由系因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第七、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和第二十一条以及(就缔约国而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条所保障的权利或自由(第二类)；

(c) 完全或部分不遵守《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当事国接受的相关国际文书所确立的关于公正审判权的国际准则，情节严重，致使剥夺自由具有任意性(第三类)；

* 塞东吉·罗兰·阿兆维的个人意见(反对)载于附件一。工作组的大多数人，特别是洪晟弼、雷·图米、埃利娜·施泰纳特和何塞·盖瓦拉·贝穆德斯的附加推理载于附件二。

** 本文件附件不译，原文照发。



(d) 寻求庇护者、移民或难民长期遭受行政拘留，且无法得到行政或司法复议或补救(第四类)；

(e) 由于存在基于出生、国籍、种族或社会出身、语言、宗教、经济情况、政治或其他见解、性别、性取向、残疾或其他状况的歧视，剥夺自由违反国际法，且目的在于或可能导致无视人权平等(第五类)。

提交的材料

来文方提交的来文

4. Alexey Pichugin 生于 1962 年，是俄罗斯联邦国民。他被捕时已经结婚，有三个年幼的儿子，无犯罪记录。他的常住地址在俄罗斯联邦莫斯科市。他曾是尤克斯石油公司安保部经济安全处经理。

a. 背景

5. 据来文方称，Pichugin 先生于 1983 年毕业于一所军事学院，在政府安保部门工作了十年，包括内政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1994 年，他转入私营安保行业，任职于 Menatep 银行。1995 年，该银行获得尤克斯的控股权，他由此开始在尤克斯安保处工作。

6. 来文方指出，Pichugin 先生被捕时任尤克斯中层安保经理，该公司当时由 Mikhail Khodorkovsky 控股。到 2000 年代初，尤克斯已成为俄罗斯联邦增长最快的第二大石油公司，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等国有企业的市场地位构成了威胁。与此同时，Khodorkovsky 先生对该国政府的批评越来越多，并开始积极资助反对党。

7. 据报告，2003 年，该国政府指控尤克斯公司滥用税收制度，过去几年一直未足额纳税，要求该公司补缴 400 多亿美元。¹ 最终，尤克斯被解散并卖给了国家控股的能源公司。2014 年，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联合申诉委员会的结论，裁定支付尤克斯前股东 500 亿美元，理由是有证据表明，国家非法侵占了尤克斯。这是史上金额最大的仲裁裁决。虽然该裁决后来被推翻，但推翻的理由是常设仲裁法院对尤克斯案无管辖权，而非裁决的实质方面。

8. 来文方认为，虽然 Pichugin 先生本人并不关心政治，但从他被捕那一刻起，他的案件便明显具有政治性质。来文方指出，Pichugin 先生是一项诬陷他犯罪的长期阴谋的受害者。对他的拘留和审判严重违反了正当程序。此外，Pichugin 先生在审讯中一再面临压力，要求他作证指控 Khodorkovsky 先生和 Platon Lebedev，而事实上他既未被控任何经济犯罪，亦未被控任何涉及 Khodorkovsky 先生或 Lebedev 先生的犯罪。至关重要的是，欧洲人权法院在两宗独立案件中认定，俄罗斯联邦对待 Pichugin 先生的方式违反了俄罗斯联邦所加

¹ Hulley Enterprises Limited 诉俄罗斯联邦，常设仲裁法院，2014 年 7 月 18 日，第 174-177 页，可查阅 www.pcacases.com/web/sendAttach/418；俄罗斯联邦政府诉 Dmitry Maruev 和 Natalya Chernysheva，2005 年 3 月 18 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鲍街治安法院)，可查阅 https://pichugin.org/wp-content/uploads/2018/02/BowStreet_Maruev_et_al.pdf (见 PDF 格式第 6 页)。

入的《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的各项条文。欧洲人权法院在两项判决中都要求重审 Pichugin 先生案。²

b. 逮捕和拘留

9. 来文方指出, 2003 年 6 月 19 日上午约 8 时, Pichugin 先生临上班前在其莫斯科公寓被逮捕。对他实施逮捕的有 22 名武装人员, 包括检察长办公室的一名上校、莫斯科地区联邦安全局的三名代表和 18 名联邦安全局“阿尔法分队”武装特工人员。他的住所和工作场所均遭到搜查。

10. 据报告, Pichugin 先生未被告知拘留原因, 亦未被告知其实际已被逮捕。他被带到检察长办公室接受审讯。一到那里, 他就被告知, 自己是一对夫妇失踪案的嫌疑人。初步审讯之后, 他被告知, 他涉嫌谋杀了这对夫妇。随后他被审前羁押在联邦安全局管理的 Lefortovo 监狱。对于他为何遭情报部门拘留, 无任何解释。

11. 2003 年 6 月 26 日, 依据《刑法》第 105 条(关于谋杀), Pichugin 先生被正式起诉。依据第 30 条(关于犯罪准备和犯罪未遂), 他被控犯罪; 另依据第 33 条(关于共犯种类), 他被控共犯。

(一) 审前羁押一再延长

12. 来文方表示, 2003 年 6 月 21 日, 莫斯科 Basmany 地区法院选择对 Pichugin 先生进行预防性拘留, 宣称他被控犯有特别严重的罪行, 因此, 如果保释, 则可能潜逃、干扰调查程序或再次犯罪。对于 Pichugin 先生就上述任何一种可能性所构成的任何风险, 并无任何具体证据提供给法院。在接下来一年期间, 提起的近十几次保释和上诉请求均被驳回, 甚至在 Pichugin 先生身患糖尿病等严重疾病时, 亦无例外。

(二) 审前羁押条件

13. 来文方指出, 2004 年 10 月 Pichugin 先生被关押在联邦安全局控制的 Lefortovo 监狱期间, 他多次被迫服用了不明药物, 使得他几乎一直处于睡眠之中。2003 年 7 月 14 日, 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 两名联邦安全局特工对 Pichugin 先生进行了大约 5 个小时的审讯, 这两名特工拒绝透露全名, 但告诉他, 他们调查的是“经济犯罪”。Pichugin 先生被告知他应该承认罪行, 但他拒绝那么做。Pichugin 先生喝了特工给他的一杯咖啡后, 双腿失去了知觉, 头感觉被撞了一下, 对随后的几个小时完全失去了记忆。那天晚上回到牢房, 他发现右手和左肘上有两处注射痕迹。八天后, Pichugin 先生终于接受了一次粗略体检, 只持续了几分钟。他的律师提起上诉, 要求调查可能使用非法审讯方法的情况, 但上诉遭到驳回。

14. 来文方指出, 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 Pichugin 先生还就尤克斯问题接受了大约 10 至 15 次审问, 对方向他施压, 要求他提供不利于 Khodorkovsky 先生

² 欧洲人权法院, Pichugin 先生诉俄罗斯(第 38623/03 号申诉书), 2012 年 10 月 23 日判决, 第 219 段; 欧洲人权法院, Pichugin 先生诉俄罗斯(第 38958/07 号申诉书), 2017 年 6 月 6 日判决, 第 47 段。

及 Leonid Nevzlin 的证词。他被告知，律师不知道最符合他利益的是什麼，他應該牽連 Khodorkovsky 先生和 Nevzlin 先生。Pichugin 先生一直堅稱自己無辜，並稱他沒有任何關於 Khodorkovsky 先生、Nevzlin 先生或其他任何人的資料可以提供。2004 年 1 月，調查終於完成，他的律師獲准查閱 7,000 多份文件的案件卷宗。Pichugin 先生及其律師每天獲准查閱這些材料的時間只有幾個小時，而且至少有一次，還被禁止複印或摘錄這些文件，甚至自費也不准。這大大減緩了審閱過程。2004 年 5 月 21 日，法院規定辯方完成文件審閱的截止日期為 2004 年 6 月 4 日。2004 年 6 月 11 日，Pichugin 先生及其共同被告受到提審，Pichugin 先生要求陪審團審判。

c. 審判程序

(一) Pichugin 先生的第一起刑事案件

15. 來文方憶及，Pichugin 先生第一起刑事案件的重點是指控他謀殺了一對夫婦以及謀殺另外兩名個人未遂。2004 年 6 月和 7 月，莫斯科市法院進行了預審。預審期間，他的律師要求由陪審團公開審訊。律師們還訴稱，他們想查閱案件卷宗中的許多文件都遭到拒絕，理由是這些文件載有“國家機密”。他們要求解釋那些材料何以列為機密，並訴稱機密文件不應采信為證據。作為回應，法官要求律師簽署保密協議，承諾不披露機密文件。律師予以了拒絕，稱自己未被告知哪些文件是機密，以及何以為機密。

16. 來文方指出，法官於 2004 年 7 月 30 日下令由陪審團秘密審訊 Pichugin 先生，因為審訊過程中會討論“機密”文件。他的律師要求提供一份文件分類決定，法院予以了拒絕。值得注意的是，案件卷宗的 7,000 多份文件中，只有大約 60 份被列為“機密”。無論如何，律師於 2004 年 9 月 2 日要求法院公開進行大部分審訊，而對涉及所謂“機密”文件的一小部分進行閉門審訊。法院駁回了這一請求。2004 年 10 月 4 日，開始訊問證人。Pichugin 先生堅決否認自己參與了任何犯罪，並行使了不作證權利。審訊中無任何實物或直接證據表明他與被指控的任何罪行有關。相反，庭審的決定性證據來自 Pichugin 先生的共同被告以及其他之前既定罪的重罪犯的傳聞和再傳聞證詞。

17. 據報告，當 Pichugin 先生的律師試圖盤問證人 K.先生時，後者拒絕回答其一系列問題。當他們提醒證人可能因拒絕作證而被起訴時，法官予以了反駁，並稱證人可以拒絕回答問題。法官還否認 Pichugin 先生的律師有权就 K.先生的品質和背景提問，聲稱這些問題“無關”。

18. 來文方指出，法官於 2004 年 12 月 9 日解散了陪審團，聲稱有七名陪審員拒絕參與該訴訟。來文方指出，法官這樣做是因為她預計陪審團會宣告 Pichugin 先生無罪。2005 年 1 月 25 日，任命了一個新的陪審團，重新開始審訊。重審過程中，重複了庭審的關鍵問題。法官拒絕了公開審判的請求，法庭也拒絕讓 Pichugin 先生的律師就 K.先生的犯罪記錄提問。此外，在終結辯論時，檢察官援引了一名證人在第一次審訊時的審前陳述，但該證人在第二次審訊時未出庭作證。2005 年 3 月 24 日，新陪審團認定 Pichugin 先生及其共同被告犯有兩項謀殺罪和兩項謀殺未遂罪。2005 年 3 月 30 日，Pichugin 先生被判处 20 年監禁。2005 年 7 月 14 日，俄羅斯聯邦最高法院維持了原判。

(二) Pichugin 先生的第二起刑事案件

19. 来文方指出，第一起刑事案件判决之后，Pichugin 先生于 2005 年 4 月 14 日，在另一起独立案件中被控两项谋杀罪和四项谋杀未遂罪。2005 年 7 月 4 日，Pichugin 先生又一次被控一项谋杀罪和一项谋杀未遂罪。据称，除其他外，他按 Nevzlin 先生以及 Menatep 银行和尤克斯的其他身份不明官员的命令，组织其他人谋杀了三名据称与尤克斯有业务冲突的个人。

20. 来文方指出，副检察长于 2005 年 7 月 6 日在多个电视新闻频道上宣称 Pichugin 先生和 Nevzlin 先生有罪。³ 这迫使 Pichugin 先生放弃了由陪审团审判的愿望，因为这一声明严重影响了陪审团候选人员的看法。虽然 Pichugin 先生一再向法官和上诉法院申诉这项声明，称其侵犯了他的无罪推定权，但他的所有申诉均被驳回。就在两个月后的 2005 年 9 月 11 日，调查人员在接受一家新闻频道采访时称，Pichugin 先生的犯罪证据无可辩驳。⁴ 而向法官和上诉法院就那一声声明重复提出的申诉则再次被驳回。

21. 据报告，2006 年 2 月 17 日，Pichugin 先生的辩护律师完成了对刑事案件卷宗的审阅，依据《刑事诉讼法》第 217 条提出了动议，要求“传唤证人和专家，并让 Pichugin 先生及其辩护律师查阅搜查和侦查档案”。查阅这一关键证据的动议被完全否决了。庭审于 2006 年 3 月 20 日开始、2006 年 8 月 17 日结束。

22. 来文方指出，在庭审过程中，莫斯科市法院听取了 Pichugin 先生和其他四名共同被告、六名受害者、五十六名证人、一名专业律师和四名专家的证词。法院还审查了刑事案件卷宗中的各种文件。与 Pichugin 先生初审时情况一样，无任何实物或其他实质性证据表明他与主要犯罪有关。相反，各项指控都基于共同被告的传闻，而共同被告在调查期间承认了罪行，但称自己受雇于某位个人，那个人据称直接或通过他人告诉他们，这些犯罪由 Pichugin 先生、最终由 Nevzlin 先生指挥。Pichugin 先生对不利于他的所有指控都不认罪，并竭力坚称他不认识任何共同被告。至关重要的是，所有四名共同被告最终都撤回了他们向调查人员提供的、牵涉 Pichugin 先生的审前陈述。⁵

23. 据报告，法院剥夺了 Pichugin 先生律师盘问共同被告的权利，这意味着辩方无法揭露审讯中牵连 Pichugin 先生和 Nevzlin 先生的阴谋细节。法院还驳回了辩方要求提出自己的免责证据来驳斥检方指控的所有请求。特别过分的决定有关一张手写便条。检方要求提供两份专家报告来确认这张便条为 Pichugin 先生笔迹，希望能证明 Pichugin 先生参与了所谓的谋杀计划。但专家报告并非结论性的。Pichugin 先生的辩护人向法庭介绍了自己的专家。尽管法院允许这名专家作证，却莫名其妙地宣告其证词无效，完全拒绝予以考虑。

³ Segodnya, “俄罗斯联邦检察长宣布 Nevzlin 是杀手组织者”，2005 年 7 月 6 日，可查阅 www.segodnya.ua/oldarchive/c2256713004f33f5c225703500509f04.html。

⁴ Vladimir Perekrest (消息报), “Pichugin 先生律师起诉检察长办公室”，2005 年 11 月 3 日，可查阅 <https://iz.ru/445396/vladimir-perekrest/advokaty-pichugina-podali-v-sud-na-genprokuraturu>。

⁵ Vera Chelishcheva (俄罗斯新报), “我决定改变局势”，2018 年 4 月 10 日，可查阅 www.novayagazeta.ru/articles/2018/04/11/76138-reshil-smenit-obstanovku。另见 Sergei Orlov, “联邦安全局卷入 Alexei Pichugin 案：一名上校于 7 月 13 日花了一个小时审问这位前尤克斯雇员”，2016 年 7 月 26 日，可查阅 www.khodorkovsky.com/the-pichugin-case/。

24. 来文方报告称，2006 年 8 月 17 日，法官宣告 Pichugin 先生有罪，判处他 21 年监禁。但 2007 年 2 月 21 日，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一有罪判决，并下令由一名新的法官重新审判。最高法院特别认定，对 Pichugin 先生的有罪判决毫无根据，而是基于推测。最高法院进一步指示，如果 Pichugin 先生重审被判有罪，初审法院应考虑加重刑罚。Pichugin 先生的重新审判从 2007 年 4 月 17 日持续到 2007 年 8 月 6 日。同初审时一样，法院阻止辩方获取关键资料，除了辩方要求信息披露的一项动议之外，驳回了所有其他动议。重新审判时将共同被告当作证人予以了重新审问。尽管四名共同被告的证词以及作为证据提供的其他文件，包括上述手写便条存在不一致，法院仍驳回了辩方要求信息披露或提交更多专家证据的动议。至关重要的是，对 Pichugin 先生进行重审的证据正是最高法院此前认定属于推测且不充分的证据。他再次被定罪。这一次，莫斯科市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指示，判处 Pichugin 先生终身监禁。他的辩护人再次对判决提起了上诉，但 2008 年 1 月 31 日，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而不管自身先前的判决曾根据同样证据推翻了对 Pichugin 先生的定罪。

25. 来文方指出，Pichugin 先生依然在押，并在俄罗斯联邦各地的各种拘留中心之间多次转移。他可以向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提起的终审上诉已全部穷尽。他一再申请赦免。但这些申请遭到断然拒绝。最近一次是在 2017 年 3 月 27 日，有公开消息称 Pichugin 先生在 Lefortovo 监狱失踪，他的家人和律师均不知其踪迹。他后来在黑海豚监狱现身，那是俄罗斯联邦最臭名昭著、难以对付的监狱之一。他至今仍在那里。

d. 法律分析

26. 来文方认为，出于如下理由，剥夺 Pichugin 先生的自由具有任意性，属于提交工作组审议的案件所适用类别的第三类。

(一) 第三类

27. 来文方认为，该国政府在本案中违反了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多项程序要求。对 Pichugin 先生的长期拘留具有任意性，属于第三类。

(二) 无证逮捕

28. 据来文方称，2003 年 6 月 19 日上午，Pichugin 先生在自己家中遭遇一名俄罗斯联邦上校及其随行的三名联邦安全局工作人员和 18 名联邦安全局“阿尔法分队”武装特工人员。他们在他家搜查了 4 个小时，然后未出示任何书面逮捕授权便给他戴上手铐，将他带走了。来文方回顾道，工作组曾多次指出，只有在逮捕现行犯时或在符合所有其他程序保障的紧急权力下实施逮捕时，⁶ 才允许无证逮捕，而这两种情况均不适用于本案。因此，来文方指出，在 Pichugin 先生的第一起刑事案件中，对他的无证逮捕令拘留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 2 款及《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之原则 12。

⁶ 见第 30/1993 号意见，和 E/CN.4/1994/27。

(三) 违反保释推定而延长审前羁押

29. 来文方指出,《公约》第九条第 3 款载有一项反对审前羁押的推定。人权事务委员会对这一条款的解释是,必须就个人状况做出个别决定。⁷工作组在重申审前羁押必须是例外而非一种默认机制时一再适用这些一般原则。⁸根据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法官应该特别考虑“犯罪的严重性、嫌疑人或被告品格资料及其年龄、健康状况、婚姻状况、职业和其他情形”,并可以依据有关被告是否会逃避出庭、是否会继续实施犯罪活动或者是否会威胁证人、其他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决定调整限制措施。⁹

30. 来文方指出,在第一批刑事案件中,Pichugin 先生于 2003 年 6 月 19 日被逮捕。如后来欧洲人权法院所述,2003 年 6 月 21 日,法官第一次审理时:“律师……要求检察官向法院提交证明对申诉人存在合理怀疑的材料。检察官以调查机密性为由予以了拒绝”。¹⁰

31. 来文方报告称,从初次庭审至该案被提交审判的 2004 年 6 月 11 日期间,Pichugin 先生重复提出保释请求、遭拒后又提起上诉的次数近十几次。所有请求均被迅速驳回,法官们仅仅以指控严重性为由便予以了驳回,并未就他的状况作出个别决定。此案除处理方式不同寻常之外,Pichugin 先生在此期间还被拘留在俄罗斯联邦情报机构监管的联邦安全局监狱,而不是司法部管理的监狱。这使得欧洲人权法院认定,依据《欧洲人权公约》第 5 条第 3 款,这侵犯了 Pichugin 先生在审判前获得释放的权利。该法院得出结论认为,就 Pichugin 先生的审前羁押而言,“当局既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亦未考虑替代的‘预防性措施’,一味只考虑指控的严重性,从而延长了申诉人的拘留期限,所据理由虽然‘相关’,但对整个拘留期限而言不能视为‘充分’”。¹¹

32. 因此,来文方诉称,在 Pichugin 先生的第一批刑事案件中,对他的审前羁押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九条第 3 款享有的应对他是否可以保释以及如果可以则应以何种条件保释等问题作出个别决定的权利。

(四) 接受公开审讯权

33. 来文方指出,从 Pichugin 先生的第一批刑事案件一开始,当局就声称他的案件涉及“国家机密”,因此有理由进行闭门审理。后来获悉,案件的大约 7,000 份文件中,只有 60 份属于“机密”文件。Pichugin 先生的律师一再要求由陪审团公开审判,并可在涉及“机密”文件时闭门审理,但请求均被拒绝。相反,尽管 Pichugin 先生的第一批刑事案件指控只涉及常规街头犯罪,但从 2004 年 7 月至 2005 年 7 月期间,所有审前会议、初审和重审全过程均秘密进行。

⁷ 见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人身自由和安全的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38 段。

⁸ 例如见第 24/2015 号和第 62/2017 号意见。

⁹ 《刑事诉讼法》,第 97 条和第 99 条。

¹⁰ 欧洲人权法院,Pichugin 先生诉俄罗斯(第 38623/03 号申请书),第 9 段。

¹¹ 同上,第 142-143 段。

34. 来文方指出，欧洲人权法院在其对 Pichugin 先生的第一起刑事案件的判决中重申，“包括审判在内的司法过程须公开进行方具有合法性”。¹² 该法院认为，《欧洲人权公约》规定的公开审讯例外情形包括涉“道德”、“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情形，但得出结论认为，Pichugin 先生的案件“并无证据表明符合这些条件”。¹³ 该法院具体解释道，事实上，莫斯科市法院“并未详细说明举行秘密审讯的理由，既未指出案件卷宗中哪些文件被视为载有国家机密，亦未解释这些文件如何与指控性质和特征相关”，而且“莫斯科市法院亦未回应申诉人要求公开审理案件但可就单场或(必要的话)多场涉密审讯清场的请求……”¹⁴ 因此，欧洲人权法院认定，这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 6 条第 1 款。¹⁵

35. 因此，来文方诉称，在 Pichugin 先生的第一起刑事案件中，他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享有的接受公开审讯权也遭到侵犯。

(五) 联络律师并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辩护的权利

36. 来文方指出，在 Pichugin 先生的第一起刑事案件中，Pichugin 先生从被拘留当天起多次被剥夺联络律师的权利。审前羁押期间，他多次受到无律师在场的审讯，联邦安全局的审讯人员迫使他提供不利于尤克斯高管 Khodorkovsky 先生和 Nevzlin 先生的虚假证词。此外，他的律师向俄罗斯联邦当局要求联络委托人的请求一再被拒绝，时间包括但不限于 2003 年 6 月 19 日、7 月 14 日和 7 月 21 日及 2004 年 3 月 19 日。

37. 来文方进一步回顾，调查一直到 2004 年 1 月 30 日才完成，那时他的律师终于获准查阅其第一起刑事案件的卷宗。Pichugin 先生及其律师被要求亲自到法院一个光线昏暗的小房间里查阅这些文件，其中包括许多审讯时的手写笔记。他们查阅这些材料的频率和时间都受到限制，并且至少有一次被禁止复印文件，甚至是自费复印，这进一步减缓了他们审阅材料的速度。2004 年 5 月 24 日，法院应检方要求，不顾辩方强烈反对而命令辩方在 2004 年 6 月 4 日前完成文件审阅。一周后的 2004 年 6 月 11 日，审判开始。

38. 来文方指出，在 Pichugin 先生的第二起刑事案件中，莫斯科市法院一再拒绝其律师查阅刑事案件卷宗，其中包括关于他分别被控杀害或企图杀害的、谋杀和谋杀未遂的受害者警方档案。

39. 来文方指出，在其第一起刑事案件中，Pichugin 先生联络律师的权利也一再受到侵犯。当局任意且不必要地限制他的律师查阅与案件有关的文件，从而干涉了他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辩护的权利。

40. 来文方认为，Pichugin 先生依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乙)项享有的联络律师以及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辩护的权利在其第一和第二起刑事案件中都受到侵犯。

¹² 同上，第 185 段。

¹³ 同上，第 186 段和第 188 段。

¹⁴ 同上，第 188 段。

¹⁵ 同上，第 192 段。

(六) 盘问和提供关键证人的权利

41. 来文方指出，审讯中无任何实物或直接证据表明 Pichugin 先生与其被指控的任何罪行有关，庭审(无论是就第一起刑事案件还是就第二起刑事案件)期间亦未提出任何此类证据。

42. 来文方指出，在 Pichugin 先生的第一起刑事案件中，指控 Pichugin 先生的唯一第一手证词来自 K.先生，而 K.先生是一名连环强奸犯和谋杀犯，已在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中服无期徒刑。K.先生声称，他目睹了一个人对 Pichugin 先生谈论关于案件另一名受害者的指示。K.先生并未声称自己真正听到过这种讨论。此外，K.先生尽管声称自己在 1999 年见过 Pichugin 先生，却未能从一群人中认出他。接受审讯期间，K.先生还在不同场合篡改了证词。

43. 来文方报告称，当 Pichugin 先生的律师试图盘问证人席上的 K.先生时，他拒绝回答一些关键问题。当辩护律师提醒他，可能因拒绝作证而被起诉时，法官反驳了辩护律师，并称证人可以拒绝回答问题。此外，当辩护律师试图盘问 K.先生的犯罪背景以及他可能通过作证从检察官那里得到的好处(如减刑)时，法官打断了辩护律师，称关于 K.先生品质和动机的问题“无关”。

44. 来文方指出，欧洲人权法院在 Pichugin 先生的第一起刑事案件中审查了这个问题，发现 K.先生的证词是宣誓证明申诉人参与这起嫁祸谋杀的唯一第一手证词。这显然是重要证据，如果没有这一证据，定罪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小。因此，这可被视为对申诉人不利的决定性证据。¹⁶ 欧洲人权法院进一步指出，K.先生并未提出拒绝回答问题的理由。特别是，他并未行使其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当申诉人律师要求主审法官提醒 K.先生回答问题是其法定责任、而拒绝回答问题可能招致刑事责任时，她回应称 K.先生有权不回答。欧洲人权法院不得不认定，由于主审法官赋予了 K.先生不回答辩方某些问题的无偿许可，申诉人盘问和质疑该证人的权利大大受到限制，更加糟糕的是，禁止申诉人就可能会损及 K.先生可信性的某些方面提问。欧洲人权法院随后认定，存在违反第 6 条第 1 款(公正审判权)和第 3 款第(4)项(盘问证人的权利)的行为。¹⁷

45. 来文方指出，在初审以及 2004 年 12 月解散陪审团后于 2005 年 1 月开始的第二次审判中，都存在这些侵犯权利的行为。K.先生再次作证时，法官拒绝命令他回答辩方提出的问题，辩方被剥夺了质疑他的品质和作证动机的权利。

46. 此外，来文方报告称，在 Pichugin 先生的第二起刑事案件中，莫斯科市法院完全剥夺了辩护律师盘问 Pichugin 先生四名共同被告的权利。这四名共同被告随后都撤回了自己将 Pichugin 先生牵连进谋杀和谋杀未遂案的证词，称调查人员要求他们说 Pichugin 先生和 Nevzlin 先生的名字，后来共同被告称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两位先生。这些情况揭示了那一剥夺权利的重大意义。此外，法院虽然最初允许辩方笔迹鉴定专家作证，表明 Pichugin 先生并未写过据称将其牵连进谋杀未遂案的那张便条，后来却莫名其妙地把她的证词搁置一边，拒绝考虑其实质内容。

¹⁶ 同上，第 200 段。

¹⁷ 同上，第 203-206 段和第 213 段。

47. 来文方指出，欧洲人权法院在审理 Pichugin 先生的第二起刑事案件时解释道，“国内法院拒绝采信‘专家’报告作为证据，这违反了手段平等原则”。¹⁸ 该法院随后指出，“检方为证明某一问题而提交法院的专家报告系在辩方未参与的情况下获得。辩方无法向专家提出问题，亦无法质疑专家，或建议自己的专家加入专家团队”。¹⁹ 该法院重申，“为了有效行使这一权利，辩方必须享有同等机会，以便提出自己的‘专家证据’”。²⁰ 因此，该法院认定，存在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 6 条第 1 款和第 3 款第(四)项的行为。²¹

48. 来文方指出，在 Pichugin 先生的第一和第二起刑事案件中，有关法院都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戊)项享有的提出和盘问证人的权利。

(七) 无罪推定权

49. 来文方回顾，在 Pichugin 先生的第二起刑事案件中，副检察长于 2005 年 7 月 5 日出现在多个电视新闻频道上，宣称 Pichugin 先生受 Nevzlin 先生指使犯下了一起谋杀罪。同样，2005 年 9 月 11 日，调查人员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声称，Pichugin 先生在 Nevzlin 先生组织和收买下实施了多起谋杀未遂和谋杀。

50. 来文方指出，欧洲人权法院在审理 Pichugin 先生的第二起刑事案件时，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一开始便注意到俄罗斯联邦政府官员接受的这两次采访。该法院解释道：“本院注意到政府声称，这些被责难的声明旨在向公众通报申诉人案件的进展情况。但是，本院认为，整体评估看来，做出那些声明时既未进行必要的斟酌，亦未保持必要的谨慎”。²² 该法院随后总结道：“本院认为，政府官员做出的这些声明等同于宣布申诉人有罪，对司法主管部门的事实评估做出了预判……本院认为，在申诉人依法被证实有罪之前，这些声明不过是鼓励公众相信申诉人有罪罢了。因此，本院认定，依据《欧洲人权公约》第 6 条第 2 款，这违反了无罪推定规定”。²³

51. 来文方指出，在 Pichugin 先生的第二起刑事案件中，政府官员侵犯了他依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2 款得到保障的无罪推定权。

政府的回应

52. 2018 年 8 月 17 日，工作组根据常规来文程序，将来文方的指控转交了该国政府，请政府在 2018 年 10 月 17 日之前提供详细资料，说明 Pichugin 先生目前的境况，并对来文方的指控做出评论。工作组还请该国政府阐明据以继续拘留他的正当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并提供详细资料说明相关法律条款和程序是否符合国际法，具体而言，是否符合对俄罗斯联邦具有约束力的国际人权法准则。此外，工作组呼吁政府确保 Pichugin 先生的身心完整。

¹⁸ 欧洲人权法院，Pichugin 先生诉俄罗斯(第 38958/07 号申请书)，第 33 页。

¹⁹ 同上，第 34 段。

²⁰ 同上，第 35 段。

²¹ 同上，第 38 段。

²² 欧洲人权法院，Pichugin 先生诉俄罗斯(第 38958/07 号申请书)，第 41 段。

²³ 同上。

53. 2018 年 10 月 11 日，该国政府要求延长提交答复的最后期限。工作组按照其工作方法第 16 段，同意将政府答复期限延长至 2018 年 11 月 1 日。该国政府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对该常规来文作出了回应。

54. 该国政府认为，莫斯科市法院陪审团依据《刑法》第 33 条第 3 款、第 162 条第 2 款、第 30 条第 3 款和第 105 条第 2 款于 2005 年 3 月 30 日判决 Pichugin 先生被控罪名成立，并依据《刑法》第 69 条第 3 款判处他 20 年监禁，由较高安全级别的监狱执行，理由如下：(a) 1998 年 10 月 5 日，组织袭击和抢劫了 v.L. Kolesov，情节严重；(b) 1998 年 11 月 28 日，组织谋杀 O. N. Kostina 未遂，情节严重；(c) 2002 年 11 月 20 日，谋杀 Gorin 已婚夫妇，情节严重。2005 年 7 月 14 日，联邦最高法院撤销原判委员会维持了该判决。

55. 此外，莫斯科市法院依据《刑法》第 33 条第 3 款、第 105 条第 2 款和第 30 条第 3 款于 2007 年 8 月 6 日判决 Pichugin 先生被控罪名成立，并依据《刑法》第 69 条第 3 和第 5 款判处终身监禁，由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执行，理由如下：(a) 1998 年 1 月 21 日，谋杀 V.A. Korneyeva 并企图谋杀其丈夫 D.N. Korneyev 未遂；(b) 1998 年 6 月 26 日，谋杀涅夫捷尤甘斯克市长 V.A. Petukhov；(c) 1998 年 11 月 24 日和 1999 年 3 月 5 日，企图谋杀 East Petroleum Handelsges MbH 经理 E.L. Rybin 及其同伴 E.L. Filippov 未遂；(d) 1999 年 3 月 5 日，谋杀 N.V. Fedotov。2007 年 7 月 15 日，莫斯科市法院撤销原判委员会对上诉维持了原判。

56. 在第一起刑事案件中，依据《刑法》第 33 条和第 105 条第 2 款(a)项，Pichugin 先生于 2003 年 6 月 19 日因涉嫌犯罪而被拘留。2003 年 6 月 21 日，莫斯科 Basmanny 地区法院选择羁押作为对他的限制措施。2003 年 7 月 15 日，莫斯科市法院撤销原判委员会支持了这一决定。Basmanny 地区法院随后延长了对他的拘留。他的律师就这些决定提起了上诉，但被判维持原判。2005 年 5 月 13 日，最高法院撤销原判委员会终止了撤销原判的上诉程序，因为那时 Pichugin 先生已于 2005 年 3 月 30 日被定罪。

57. 此外，该国政府认为，Pichugin 先生的公正审判权在其两起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均未受到侵犯。为了支持这一说法，政府引用了最高法院主席团的决定。

58. 该国政府认为，考虑到所犯行为对社会的严重危害，Pichugin 先生被依法判处监禁。他的审前羁押期限完全计入了他的刑期。鉴于上述情况，关于 Pichugin 先生的刑事起诉为委托操作、其合法权利遭到侵犯、对其逮捕系任意逮捕的指控均毫无根据。

来文方的进一步评论

59. 2018 年 11 月 2 日，该国政府的回应转交了来文方，供其进一步评论。来文方在 2018 年 11 月 7 日的答复中指出，与政府说法相反，对 Pichugin 先生的逮捕、审判、定罪、量刑和长期拘留均具有任意性，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法庭和其他可信政府间机构和人权团体均已承认这一点。例如，欧洲人权法院(在两个独立案件中)裁定对 Pichugin 先生的审判根本不公平；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 Pichugin 先生案中存在“严重违反程序的行为”；纪念人权中心、自由之家和拉乌尔·沃伦贝格人权中心均将他定为政治犯或良心犯。该国政府在其答复中要求工作组不仅不相信 Pichugin 先生及其律师所述，而且不相信上述所有独立国际法庭和机构。

60. 第一，来文方辩称，该国政府答复的大部分内容均未涉及来文方最初所提交材料中的具体主张或明确证据。第二，来文方辩称，政府作了全部否认，但未具体回应所提交材料中的各项指控，亦未提出任何反驳证据。第三，来文方补充道，即便是政府作出了具体、实质性回应部分，也有若干错误说法，与明确的证据相悖，这本身损害了其可信性。第四，政府援引了最高法院主席团的决定，来支持其关于 Pichugin 先生的权利未受侵犯的说法。但是，来文方指出，这些决定与工作组评估政府是否侵犯 Pichugin 先生的国际法权利无关。事实上，政府援引的最高法院决定与欧洲人权法院的决定直接冲突。

61. 最后，来文方反驳了政府的论点，即 Pichugin 先生实际犯有所述罪行。如最初提交的材料所述，对 Pichugin 先生的指控系出于政治动机。来文方回顾道，工作组的作用不是以自身取代某一国内法庭，而是确定对某个人剥夺自由的做法是否具有任意性、是否违反国际法。正如最初所提交材料中详细解释的那样，对 Pichugin 先生的拘留显然具有任意性，属于非法拘留。

讨论情况

62. 工作组感谢来文方和该国政府就剥夺 Pichugin 先生自由一事进行了及时而广泛的接触并提交了材料。

63. 工作组曾在判例中确立了处理证据问题的方式。如果来文方提供了初步立案证据，证明违反国际要求的情节构成了任意拘留，那么政府若要反驳指控，则须承担举证责任(A/HRC/19/57, 第 68 段)。工作组忆及，如果有人指控公共部门未给予某人其有权享有的某些程序性保障，则举证责任在于公共部门，因为后者更能够证明自己遵循了适当的程序，并适用了法律要求的保障。²⁴

64. 作为初步事项，工作组考虑了 Pichugin 先生之前向欧洲人权法院提交的两份诉请书是否有碍工作组对本案所提交材料的审议。欧洲人权法院于 2012 年 10 月 23 日对第一起案件(第 38623/03 号诉请书)作出了判决，后于 2017 年 6 月 6 日对第二起案件(第 38958/07 号诉请书)作出了判决。²⁵

65. 工作组的职权范围由人权理事会(2006 年前为前人权委员会)的有关决议和工作组的工作方法界定。因此，工作组有责任处理与人权理事会赋予其任务范围内的问题有关、按照其工作方法提交的来文。适用的程序规则并未规定工作组不应审议正在或已经根据其他区域人权保护制度审议的事项。在这方面，应当忆及，例如工作组曾宣布自己有能力处理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已审议过的案件。²⁶

66. 工作组认为，现在并无理由要背离先例，将欧洲人权法院的先前判决与美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区别对待。即使假定工作组在法律上有义务这样做，工作组也远远不能认定本案具备可能造成决定冲突的三个要素，即相同的人员、主题事项

²⁴ Ahmadou Sadio Diallo (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和国)，案情实质，判决书，《2010 年国际法院报告》，第 660-661 页中第 639 页，第 55 段；第 41/2013 号意见，第 27 段，及第 59/2016 号意见，第 61 段。

²⁵ 见工作组过去在第 52/2011 号意见中的讨论，第 25-38 段。

²⁶ 例如见，第 9/2005 号、第 52/2011 号、第 21/2013 号、第 16/2016 号、第 57/2016 号和第 53/2018 号意见。

和案由。虽然工作组与欧洲人权法院都处理了 Pichugin 先生诉俄罗斯联邦的案件，但相似之处仅止于此，而两者之间的显著区别如下：

(a) 工作组调查《世界人权宣言》和《公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而欧洲人权法院则完全依据《欧洲人权公约》作出决定。两者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公约》第九和第十四条与 Pichugin 先生据以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的《欧洲人权公约》第 5 和第 6 条之间的差异不仅在于语义上：例如，《欧洲人权公约》第 5 条第 1 款规定了剥夺个人自由的正当理由由详尽清单，却未规定全面禁止“任意”拘留；²⁷

(b) 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两起案件仅涉及俄罗斯联邦法院对 Pichugin 先生的第一和第二级审判，但工作组将处理在尤克斯争端的更广泛背景下所发生的一系列涉嫌侵犯人权的行为；

(c) 虽然欧洲人权法院可以在判决的处置部分判处对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的货币补偿，并且经常“重申”，对于不顾可能侵犯公正审判权而予以定罪的申诉人，最适当的补救形式原则上就是重新审理或重启诉讼程序，而且“注意到”有国内法律条款规定，在欧洲人权法院认定存在违约行为的情况下重启刑事诉讼程序，就像其在所受理的 Pichugin 先生两起案件中那样，²⁸ 但该法院并不要求立即释放，也不要求展开全面、独立调查，或对责任人采取适当措施，抑或通过现有一切手段传播其意见——这些正是工作组所审议案件的所有标准补救；

(d) 欧洲人权法院在那两起案件中不能、也的确未处理俄罗斯联邦后来发展情况造成的更多侵犯权利行为，如俄罗斯联邦司法部门不顾其在《欧洲人权公约》以及国内《刑事诉讼法》下的义务而未批准 Pichugin 先生要求重新审判的请求。

67. 工作组在其所有活动中都坚持其工作方法和诉讼各方一致采用和接受的惯例。出于这些原因，工作组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并有义务为了正义和人权而审理本案。

第一类

68. 工作组着手审议是否存在提不出任何法律依据而剥夺自由的第一类违约情形。

69. 工作组注意到，当局逮捕 Pichugin 先生时未出示有效的逮捕令，亦未告知其逮捕理由，且未迅速告知对其提出的指控，这意味着对他剥夺自由缺乏法律依据。这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和《公约》第九条第 2 款。如《联合国关于被剥夺自由者向法院提起诉讼权利的补救和程序的基本原则和准则》所指出，若剥夺自由的行为不符合依据且未遵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则属于非法。²⁹ 当

²⁷ 工作组注意到，欧洲人权法院在其判例中解释了衡量拘留任意性要素的规定；但是，同一法院将人身安全权归入了人身自由权，从而消除了人身安全权的独立法律意义。见 Saadi 诉联合国(第 13229/03 号申诉书)，2008 年 1 月 29 日判决，第 67 段。

²⁸ 欧洲人权法院，Pichugin 先生诉俄罗斯(第 38623/03 号申诉书)，第 219 段；欧洲人权法院，Pichugin 先生诉俄罗斯(第 38958/07 号申诉书)，第 47 段。

²⁹ 见 A/HRC/30/37，第 12 段。

局这样做还剥夺了他对拘留合法性提出质疑的权利，进一步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和《公约》第二条第 3 款及第九条第 4 款。³⁰

70. 此外，工作组对来文方关于秘密拘留的指控表示严重关切，即在 2017 年 3 月的一段时间内，Pichugin 先生的家人和律师都不知道他的命运和下落，直到他后来在黑海豚监狱现身，且至今仍在那里。工作组注意到，隐藏他的命运和下落是将其置于法律保护之外，这损害了他的生命权、人身自由和安全权、不受酷刑权以及在拘留期间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的权利。³¹ 工作组认为，这类将被拘留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剥夺自由无论如何都不存在有效的法律依据，特别因为这样还剥夺了他们质疑拘留合法性的权利，这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和《公约》第二条第 3 款及第九条第 4 款。

71. 鉴于上述情况，工作组认为，剥夺 Pichugin 先生自由并无法律根据，因此具有任意性，属于第一类。

第三类

72. 工作组现在着手审议所指控侵犯 Pichugin 先生接受公正审判权和违反正当程序的情节是否严重到致使剥夺自由具有任意性，因而属于第三类。

73. 工作组注意到，Pichugin 先生被延长审前羁押而未被批准保释。虽然任何延迟审判的合理性都必须逐案评估，并考虑案件的复杂性，但在本案中，该国政府未根据合法性、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就延长审前羁押提供任何正当理由。在本案中，尤其是考虑到法院草率驳回 Pichugin 先生一再提出的保释请求，工作组认定，该国政府既未在合理时间内审判 Pichugin 先生，亦未释放他，这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一条第 1 款和《公约》第九条第 3 款及第十四条第 3 款(丙)项。

74. 工作组希望指出，该国政府自始至终都未能尊重 Pichugin 先生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和《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乙)项和(丁)项。首先，在他被拘留当天，对他进行了无律师在场的审讯，使他得不到法律保护。其次，Pichugin 先生在刑事诉讼关键阶段被剥夺了联络律师的权利，而那时当局一再企图胁迫他认罪。第三，他的律师未及时获得全面查阅案件卷宗、以充分准备辩护的机会。

75. 工作组还对有关当局在 Pichugin 先生审前羁押期间让其服用精神药物的指控表示关切，这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五和第二十五条、《公约》第七和第十条以及《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之原则 6。这种行动还违反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这种强迫服用药物的行为本身不仅严重侵犯人权，而且严重摧毁了 Pichugin 先生为自己辩护的能力，阻碍了他行使公正审判权，特别是《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庚)项规定的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

³⁰ 另见《欧洲人权公约》第 5 条第 4 款和第 6 条第 1 款。

³¹ Yrusta 诉阿根廷(CED/C/10/D/1/2013)，第 10.3-10.4 段。

76. 在审讯期间，未给予 Pichugin 先生适当机会让其讯问对其不利的证人或证据，或者向法庭提供自己的证人和证据，这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一条第 1 款和《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丁)项。

77. 工作组关切地注意到，因涉“国家机密”而对 Pichugin 先生进行了闭门审讯，但该国政府却未就“国家机密”提供任何解释。这进一步侵犯了他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和《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接受公开审讯的权利。

78. 工作组认为，这种不平衡的程序令人对《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和《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规定的手段平等、程序公平以及法庭的合格性、独立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

79. 该国政府还未能尊重 Pichugin 先生的无罪推定权，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一条第 1 款、《公约》第十四条第 2 款以及《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之原则 36。工作组深感关切的是，副检察长在多个新闻频道上宣称 Pichugin 先生有罪。两个月后，调查人员于 2005 年 9 月 11 日在电视上声称，Pichugin 先生的犯罪证据无可辩驳。工作组忆及，所有公职人员都有责任避免预断审判结果，例如不发表公开声明确认被告有罪。³²

80. 鉴于上述原因，工作组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侵犯公正审判权、违反正当程序的行为情节严重，致使剥夺 Pichugin 先生自由具有任意性，属于第三类。

第五类

81. 工作组现在着手审理剥夺 Pichugin 先生自由的行为是否构成国际法规定的歧视，是否属于第五类。

82. 工作组注意到，Pichugin 先生是尤克斯的前雇员，而尤克斯多年来一直是政府针对的目标。Pichugin 先生的遭遇与该公司其他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所遭受的虐待模式相符。就此而言，工作组还认为，Pichugin 先生被任意剥夺自由的原因是他未在政府公开迫害尤克斯一事上与当局合作。因此，工作组认为，该国政府基于 Pichugin 先生与尤克斯公司的联系而歧视他他被逮捕、拘留和监禁的唯一似乎有了解释。出于这些原因，工作组认为，剥夺 Pichugin 先生自由的行为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二条和《公约》第二条第 1 款以及第二十六条，理由是存在基于政治或其他见解的歧视，且目的在于并已导致无视人权平等，因此属于第五类。

处理意见

83. 鉴于上述情况，工作组提出以下意见：

剥夺 Alexey Pichugin 的自由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二、第五、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一和第二十五条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第七、第九、第十、第十四和第二十六条，为任意剥夺自由，属于第一、第三和第五类。

³² 见第 26/2018 号意见，第 64 段；第 83/2017 号意见，第 79 段；第 33/2017 号意见，第 86(e)段。

84. 工作组请俄罗斯联邦政府采取必要措施，立即对 Pichugin 先生之境况予以补救，使之符合相关国际准则，包括《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准则。

85. 工作组认为，考虑到本案的所有情节，适当的补救办法是立即释放 Pichugin 先生，并根据国际法赋予他可强制执行的获得赔偿和其他补偿的权利。

86. 工作组敦促该国政府确保围绕任意剥夺 Pichugin 先生自由的情形展开全面、独立调查，并对侵犯其权利的责任人采取适当措施。

87. 工作组请该国政府通过现有一切手段尽可能广泛地传播本意见。

后续程序

88. 工作组依照其工作方法第 20 段，请来文方和该国政府提供资料，说明针对本意见中的建议所采取的后续行动，包括：

(a) Pichugin 先生是否已经获释；如果是，何日获释；

(b) 是否已向 Pichugin 先生提供赔偿或其他补偿；

(c) 是否已对侵犯 Pichugin 先生权利的行为展开调查；若已展开调查，说明调查结果；

(d) 是否已按照本意见修订立法或改变惯例，使俄罗斯联邦的法律和惯例符合其国际义务；

(e) 是否为落实本意见采取了其他行动。

89. 请该国政府向工作组通报在执行本意见中的建议时可能遇到的任何困难，以及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技术援助，例如是否需要工作组来访。

90. 工作组请来文方和该国政府在本意见转交之日起六个月内提供上述资料。然而，在本意见的后续行动中若有与案件有关的新情况引起工作组的注意，工作组保留自行采取行动的权利。工作组能够借助此类行动，让人权理事会了解工作组建议的执行进展，以及任何未采取行动的情况。

91. 工作组回顾，人权理事会鼓励各国与工作组合作，请各国考虑工作组的意见，必要时采取适当措施对被任意剥夺自由者之境况予以补救，并将采取的措施通知工作组。³³

[2018 年 11 月 23 日通过]

³³ 见人权理事会第 33/30 号决议，第 3 段和第 7 段。

Annex I

Individual opinion of Sètondji Roland Adjovi (dissenting)

1. I regret that I could not join the opinion of the Working Group in the present case concerning Alexey Pichugin. In my view, the Working Group has no jurisdiction as there is no dispute to be resolved between Mr. Alexey Pichugin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s a result, the Working Group should have simply dismissed the request.

2. Indeed, the Working Group is a body for th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related to detention, a special procedure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The proceedings before the Working Group involve an individual (or a group of individuals) against a Member State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ar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ndate and rules set out in the Working Methods of the Group. Even if the texts that govern its mandate in this area do not mention the criteria of admissibility and jurisdiction, the question cannot be avoided because it is self-evident and constitutes an essential prerequisite for the ability of the Working Group to consider the merits of the case. It is therefore for the Working Group, both *de jure* and on a preliminary basis, to raise this question of admissibility and jurisdiction, even if, as in this case, the parties have not raised it.

3. Secondly, I understood that all the factual conclusions reached by the majority of the Working Group had already been taken into account by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on the two occasions when it was seized by the applicant.¹ The Court has concluded for the most part, in favour of the applicant so that the dispute related to arbitrariness of the detention is resolved and therefore no longer exists. For issues on which the applicant has not been successful, the dispute also does not exist unless the applicant challenges the Court's decision through an appeal. The Working Group is not the competent body for such an appeal procedure.

4. The existence of a dispute is well established as a condition of jurisdic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s established by 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in the *Mavrommatis Concessions in Palestine* Case: "A dispute is a disagreement on a point of law or fact, a conflict of legal views or of interests between two persons."²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has deepened this definition of legal dispute a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parties have opposing views, with similar conclusions where the absence of dispute has led to the rejection of the application.³

¹ Case No 1. Pichugin v. Russia, Application No. 38623/03, Judgment (Merits and Just Satisfaction), Court (First Section), 23 October 2012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114074>). Case No 2. Pichugin v. Russia, Application No. 38958/07, Judgment (Merits and Just Satisfaction), Court (Third Section Committee), 6 June 2017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174061>).

²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Case of the *Mavrommatis Palestine Concessions*, Judgement No. 2, Serie A, No. 2, 30 August 1924, p. 11.

³ Interpretation of Peace Treaties, Advisory Opinion: I.C.J. Reports 1950, p. 65, esp. p. 74. See also: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Georgia v. Russian Federation*),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I.C.J. Reports 2011, p. 70, esp. paras. 23-114 ;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Obligation to Prosecute or Extradite (*Belgium v. Senegal*), Judgment, I.C.J. Reports 2012, p. 422, esp. paras. 44-55 ; Alleged Violations of Sovereign Rights and Maritime Spaces in the Caribbean Sea (*Nicaragua v. Colombia*), Counter-Claims, Order of 15 November 2017, I.C.J. Reports 2017, p. 289, p. 3 ; Obligations concerning Negotiations relating to Cessation of the Nuclear Arms Race and to Nuclear Disarmament (*Marshall Islands v. Pakistan*), Order of 9 July 2015, I.C.J. Reports 2015, p. 589, esp. paras. 25-55 ; Obligations concerning Negotiations relating to Cessation of the Nuclear Arms Race and to Nuclear Disarmament (*Marshall Islands v. United Kingdom*),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I.C.J. Reports 2016, p. 833, esp. paras. 26-58;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 and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19 April 2017, I.C.J. Reports 2017, p. 104, esp. paras. 22-39; ICJ, Immunities and Criminal Proceedings (*Equatorial Guinea v. France*),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ement of 6 June 2018.

5. That being sai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as not yet implemented the Court's decisions. This leads to a dispute of a different nature: the enforcement of the Court's decisions. This dispute, like the possible appeal mentioned above, is not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Working Group, and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it is pending before the Ministerial Committee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⁴

6. In conclusion, the Working Group, in my opinion, should have dismissed the request on the ground that it does not present a detention dispute that would fall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⁴ Information on the execution of the Court's decisions before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is available online (<http://hudoc.exec.coe.int/ENG?i=004-14064>). The Pichugin case is discussed as part of a global case with the Klyakhin case as the main one (Application No. 46082/99). See the decision of the Ministerial Committee CM/Del/Dec(2018)1318/H46-20.

Annex II

Additional reasoning of the majority of the Working Group, notably Seong-Phil Hong, Leigh Toomey, Elina Steinerte and José Guevara Bermúdez

1. We wish to offer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reasons. We consider that these reasons are important to the Working Group's jurisdiction to consider matters that have been heard by other regional human rights mechanisms, and we have therefore chosen to elaborate further on this issue.

2. The competence of the Working Group is defined in the resolutions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formerly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until 2006) and the Working Group's Methods of Work.¹ The law of these instruments is decisive, and binding upon the Working Group. Where it is silent, the Working Group's jurisprudential *acquis*, accumulated over the past quarter century, has filled the *lacunae*.

3.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Working Group naturally differs from those regulating other sister human-rights bodies. For instance, the Working Group, as a special procedure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deriving its ultimate authority and powers from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does not require the source to exhaust domestic remedies before making submissions to it unlike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and other treaty bodies whose founding instruments makes explicit reference to it as a condition of admissibility.² In its Deliberation 02 (E/CN.4/1993/24, 12 January 1993, pp. 9-13) on admissibility of the communications,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documents of a declaratory nature adopted at its third session (23 to 27 March 1992), the Working Group clarified that "if an admissibility procedure requires the prior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that condition is expressly provided for in the instrument or rule concerned as borne out, for instance, by article 41 (1) (c)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nd since "there is no such provision in resolution 1991/42 which lays down the Working Group's mandate ... it is not within its mandate to require local remedies to be exhausted in order for a communication to be declared admissible" (paras. 6-8).³ The Working Group's consistent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its case-law leaves no room for doubt on this matter.⁴

4. The Working Group would like to stress that the procedural rules for handling communications from sources and responses of Governments are contained in its methods of work and in no other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 that the parties might consider applicable.⁵

¹ A/HRC/36/38.

² See article 11 (3) and 14 (7) (a) of the 1965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rticle 41 (1) (c) of the 1966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nd article 5 (2) (b) of the 1966 Optional Protocol thereto; articles 21 (1) (c) and 22 (4) (b) of the 1984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rticles 76 (1) (c) and 77 (3) (b) of the 1990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article 4 (1) of the 1999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rticle 2 (d) of the 2006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rticle 31 (2) (d) of the 2006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and article 3 (1) of the 2008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rticle 7 (5) of the 2011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n a communications procedure.

³ See also E/CN.4/2006/7 (12 December 2015), paras. 10–14.

⁴ See opinions Nos. 44/2018, para. 71; 43/2018, para. 63; 42/2018, para. 67; No. 11/2018, para. 66; No. 8/2018, para. 30; No. 41/2017, para. 73; No. 38/2017, para. 67; No. 33/2015, para. 108; No. 19/2013, para. 28; No. 31/2006, para. 19; and No. 11/2000, para. 13. See also the unsuccessful resort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this false rule in opinion No. 14/2016, para. 51.

⁵ Opinion No. 44/2018, para. 71; No. 43/2018, para. 63; No. 42/2018, para. 67; No. 8/2018, para. 30.

The relevant procedural rule in the Working Group's methods of work can be found in part VII (Coordination with other human rights mechanisms) therein, which provides as follows:

VII. Coordination with other human rights mechanisms

33.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good coordination that already exists between the various United Nations bodies working in the field of human rights (se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1997/50, para. 1 (b)), the Working Group takes action as follows:

(a) If the Working Group, while examining allegations of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considers that the allegations could be more appropriately dealt with by another working group or special rapporteur, it will refer the allegations to the relevant working group or special rapporteur within whose competence they fall, for appropriate action;

(b) If the Working Group receives allegations of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that fall within its competence as well as within the competence of another thematic mechanism, it may consider taking appropriate action jointly with the working group or special rapporteur concerned;

(c) If communications concerning a country for which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has appointed a special rapporteur, or another appropriate mechanism with reference to that country, are referred to the Working Group, the latter,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rapporteur or the person responsible, shall decide on the action to be taken;

(d) If a communication addressed to the Working Group is concerned with a situation that has already been referred to another body, action shall be taken as follows:

(i) If the function of the body to which the matter has been referred is to deal with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within its area of competence (e.g. mos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independent experts), the Working Group shall retain competence to deal with the matter;

(ii) However, if the body to which the matter has already been referred has the function of dealing with individual cases (e.g.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and other treaty bodies), the Working Group shall transmit the case to that other body if the person and facts involved are the same.

34. The Working Group shall not make visits to countries for which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has already appointed a country rapporteur or another appropriate mechanism with reference to that country, unless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r the person responsible considers the visit by the Working Group to be useful.

5. It is evident from the ordinary meaning to be given to the terms in their context that Part VII concerns the Working Group's possible overlapping competence with other "United Nations bodies working in the field of human rights" in processing individual cases and country visits. Clearly,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s not a subsidiary body of the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but a distinct regional judicial organ established by the member government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by means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signed at Rome on 4 November 1950 (commonly known as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The Council of Europe, created by the 1949 Statute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and accorded legal personality and capacity as well as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by the 1949 General Agreement on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also has its own independent existence. In juridical term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re two separate entities. The plain reading of the text alone should dispel any concern that the Working Group would be breaching its own methods of work by taking up Mr. Pichugin's case.

6.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of Part VII suggests likewise. In its first annual report (E/CN.4/1992/20, 21 January 1992), the Working Group reported to the then-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that during its second session (16 to 20 December 1991): "The Working

Group decided that, in considering the cases submitted to it, in a spirit of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it would seek, whenever necessary, information from other relevant United Nations bodies and, in particular, Special Rapporteurs of the Commission and the Sub-Commission and the treaty monitoring bodies. The Working Group likewise expressed its willingness to share the information at its disposal with any United Nations organ wishing to have such information” (para. 20). In its second annual report (E/CN.4/1993/24, 12 January 1993), the Working Group reiterated intra-UN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stating specifically that it “further continued to exchange views, when it deemed it to be necessary, with members of the secretariat servicing treaty monitoring bodies, in particular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or studying other areas relevant to the Working Group’s mandate” (paras. 6-7).

7. In paragraph 7 of its resolution 1993/36 of 5 March 1993 (E/CN.4/RES/1993/36), the then-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w]elcome[d] the importance that the Working Group attaches to coordination with other mechanisms of the Commission as well as with treaty-monitoring bodies, and invite[d] it to take a position in its next report on the issue of the admissibility of cases submitted to the Working Group when they are under consideration by other bodies”. To meet the Commission’s concerns, the Working Group in its third annual report (E/CN.4/1994/27, 17 December 1993) distinguished between two categories of situations,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 body seized of the matter other than the Working Group “deals either with developments i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or with individual cases of violations alleged by persons”: the *non bis in idem* principle does not apply to the first category (working groups, special rapporteurs or representatives, independent experts) whereas it could apply to the second category (Human Rights Committee in the context of the First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on the one hand, the confidential procedure under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resolution 1503 (XLVIII) of 27 May 1970, on the other) (paras. 64-70). The Working Group also added paragraph 18 to its revised methods of work: “The Working Group shall also communicate any decision it adopts to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body, whether thematic or country-oriented, or to the body set up by the appropriate treaty for the purpose of proper coordination between all organs of the system” (Annex I: Revised methods of work as of December 1993).

8. In paragraph 1 (b) of its resolution 1997/50 of 15 April 1997, the Commission took note of “the importance that the Working Group attaches to coordination with other mechanisms of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and other relevant United Nations bodies and treaty-monitoring bodies, as well as to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such coordination” and “encourage[d] the Working Group to take all the necessary steps to avoid duplication with those mechanisms, in particular regarding the treatment of the communications it receives and field visits”.⁶ The Working Group duly complied by adding Part V (Coordination with other human rights mechanisms) to the revised methods of work which has remained substantively unchanged since then (E/CN.4/1998/44, 19 December 1997, Annex I).⁷

9. It is clear from the above that Part VII (Coordination with other human rights mechanisms) of the Working Group’s methods of work aims to avoid conflicting decisions in individual quasi-judicial cases between the Working Group, on one hand, and the special procedures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or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treaty bodies serviced by the UN Secretariat’s staff and facilities, on the other.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 non-UN regional judicial organ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does not fit the bill.

⁶ Prior to resolution 1997/50, the Commission repeatedly took note of the importance that the Working Group attached to coordination with other mechanisms of the Commission and with the treaty-monitoring bodies as well as to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role of the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such coordination, and encouraged the Working Group to avoid unnecessary duplication in paragraph 5 of its resolution 59/1995 of 7 March 1995 and paragraph 8 of resolution 28/1996 of 19 April 1996.

⁷ The entire Part V was moved to Part VII in the following revision of 2010. A/HRC/16/47, 19 January 2011, Annex: Revised methods of work of the Working Group.

10. With respect to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the Working Group in opinion No. 4/2000 concerning Sybila Arredondo Guevara (Peru), adopted on 16 May 2000, decided to transmit, pursuant to paragraph 25 (d) [which moved to paragraph 33 (d) in 2010] of its methods of work, Ms. Arredondo's case to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without expressing an opinion on the arbitrary nature of the detention, after ascertaining that the case was being considered by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on the basis of the same facts and allegations as the communication received by the Group (para. 10). The Committee three months later adopted its view after noting the Working Group's referral of the case.⁸

11. Referring to the Arredondo case, it was suggested by one veteran observer that attempts were being made by the Secretariat to process a case where domestic remedies have been exhausted under the Optional Protocol, while one where they have not may be processed for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king Group.⁹ Indeed, the Working Group and the Committee appear to have settled on this new *modus vivendi* of complementary division of labour in opinions No. 28/2001 (adopted on 3 December 2001),¹⁰ No. 27/2005 (adopted on 30 August 2005),¹¹ No. 10/2009 (adopted on 1 September 2009)¹² and No. 39/2012 (adopted on 31 August 2012).¹³ Because article 5 (2) (a) of the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venant merely requires that the same matter "is not being examined" under another procedure of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or settlement, the Committee need not refrain itself from passing judgment on cases where the Working Group has finished examination. The Committee expressed its view in cases that have been filed without opinion by the Working Group¹⁴ or, as in opinion No. 15/2001 (adopted on 13 September 2001), where the detention has been declared not arbitrary.¹⁵

12. By contrast, the Working Group has evinced no awareness that it is legally bound to coordinate or avoid duplication with regional judicial organs. The Working Group has declared itself competent to deal with cases which had also been considered by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rather explicitly in opinion No. 9/2005 concerning Alfonso Martín del Campo Dodd (adopted on 25 May 2005) on the ground that "the complaint is related to the specific tasks set forth in resolution 1991/42 of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para. 7).¹⁶ The Working Group further elaborated its position on the matter in depth in opinion No. 52/2011 (adopted on 17 November 2011), stressing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N special procedures, on the one hand, and both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treaty bodies, on the other (paras. 25–38). In opinion No. 21/2013 (adopted on 27 August 2013), the Working Group proceeded to render its decision even though the two detainees in question had been released upon recommendation by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and their case was pending before the Inter-American Court (paras. 26–29).

⁸ Arredondo v. Peru, Communication No. 688, adopted on 14 August 2000, CCPR/C/69/D/688/1996, paras. 10.2.

⁹ Nigel Rodley,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Treaty Bodies and Special Procedures of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Complementarity or Competition?", Human Rights Quarterly Vol. 25, No. 4 (Nov., 2003), pp. 882–908, at p. 896.

¹⁰ Madani v. Algeria, Communication No. 1172/2003, adopted on 28 March 2007, CCPR/C/89/D/1172/2003, paras. 2.7 and 7.2.

¹¹ Al-Rabassi v. Libya, Communication No. 1860/2009, adopted on 18 July 2014, CCPR/C/111/D/1860/2009, para. 6.2.

¹² Eligio Cedeño v.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Communication No. 1940/2010, adopted on 29 October 2012, CCPR/C/106/D/1940/2010, para. 6.2.

¹³ Belyatsky v. Belarus, Communication No. 2165/2012, adopted on 24 October 2014, CCPR/C/112/D/2165/2012, para. 7.2.

¹⁴ Aboufaied v. Libya, Communication No. 1782/2008, adopted on 21 March 2012, CCPR/C/104/D/1782/2008, para. 6.2.

¹⁵ Cabal and Pasini v. Australia, Communication No. 1020/2001, adopted on 7 August 2003, CCPR/C/78/D/1020/2001, paras. 4.2 and 5.2.

¹⁶ The Working Group also cited its precedents of opinions No. 16/1998 and No. 28/1998, both adopted on 3 December 1998.

13. The Working Group sees no reason why it should depart from its precedents and treat the prior judgments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ny differently from those of the Inter-American Court. Even assuming *arguendo* that the Working Group is under legal obligation to do so, the Working Group is far from convinced that the three essential factors of identical persons, subject-matter and case, which could lead to conflicting decisions, apply in the present case. While the Working Group, as well as the European Court, addressed the complaints by Mr. Pichugin against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similarities end there while the following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separate them:

(a) The Working Group investigates the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under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and the Covenant while the European Court decides solely upon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The differences, especially between articles 9 and 14 of the Covenant and articles 5 and 6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upon which Mr. Pichugin made his claims before the European Court, are not merely semantic: for instance, article 5 (1)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provides an exhaustive list of justifications for the deprivation of personal liberty, but stipulates no comprehensive ban on “arbitrary” detention;¹⁷

(b) The two cases before the European Court narrowly concerned Mr. Pichugin’s first and second trial in the Russian courts, but the Working Group will address a full range of alleged violations that arose 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Yukos dispute;

(c) While the European Court can order monetary compensation for pecuniary and non-pecuniary damages in the dispositive part of the judgment, and often “reiterates” that the most appropriate form of redress for an applicant convicted despite a potential infringement of fair trial rights would, in principle, be trial *de novo* or the reopening of the proceedings, and “notes” the domestic legal provision providing for the reopening of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if the European Court finds a violation, as it has done in the two cases brought before it by Mr. Pichugin,¹⁸ it does not require immediate release, a full and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and appropriate measures against those responsible or dissemination of the Opinion through all available means, all standard remedies in the cases considered by the Working Group;

(d) The two European Court cases cannot and do not address the additional violations arising from the later development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uch as the failure of the Russian judicial authorities to grant Mr. Pichugin’s request for a new trial despite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and the domestic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14. For these reasons, the Working Group considers itself wholly competent and obliged to hear Mr. Pichugin’s complaints in the interest of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¹⁷ The Working Group notes that the European Court has interpreted the provision to weigh elements of arbitrariness of detention in its jurisprudence; however, the same Court eliminated the independent legal significance of the right to personal security by subsuming it under the right to personal liberty. *Saadi v. United Kingdom*, Application no. 13229/03 (29 January 2008), para. 67.

¹⁸ *Pichugin v. Russia*, Application no. 38623/03 (23 October 2012), para. 219; *Pichugin v. Russia*, Application no. 38958/07 (6 June 2017), para. 47.